

# 国际新闻报道主题模型分析 及解释性理论探思

金 苗

**内容提要** 意义与意图共生共存于文本之中,解读意义和透视意图一直是国际新闻报道研究的重要维度。基于海量文本数据的计算机主题模型分析,能够在字符关联中显现意义,在语义结构中洞见意图,正在成为国际传播研究的新方法。然而,当前引入隐含主题挖掘技术的人文社科研究存在一个共同的瓶颈,即多数囿于方法创新,缺乏学科理论阐释。以国际新闻报道主题模型研究为例,在意义解读层面,具有结构分析能力的“框架理论”和拥有内容深究优势的“语境理论”在隐含主题分析上呈互补之态;而在意图透视层面,分析显在意图的“国家利益理论”和揭示隐藏意图的“镜像理论”在隐含主题分析时可互为表里。单纯的隐含主题挖掘及其文本关联聚类的主题模型数据结果,只有结合能够与之互洽的学科解释性理论才能实现其学术和应用价值,人文社科其它研究领域亦同此理。

**关键词** 国际新闻报道 主题模型 框架理论 语境理论 国家利益理论 镜像理论

金 苗,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员 210023

## 引 语

在传统理念中,主题(topic)指文本的主旨和要点,它们作为文本构思、选材、表达和修辞的主导性依据,一直都是文本分析的关键研究对象。近年来,随着文本挖掘技术的发展,一种计算机自然语言处理的新方法——主题模型(Topic Modeling)正在得到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应用。它通过在给定的海量文本中提取隐含主题来实现文本聚类,从而揭示文本关联。以最简单且应用最广的主题模型“潜在狄利克雷分布法”(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 LDA)为例,它是由D. M. Blei团队2003年研发的一个贝叶斯网络分层模型,包含文档、主题和词汇三个层次。每个文档都存在着混合分布的不同隐含主题,主题模型的任务就是以无监督计算的方式挖掘出文档中不同单词的分布规律,聚合类似分布规律的

---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政府善治视角的国外社会化媒体传播技巧研究”(14BXW034)阶段性成果。

单词,提取文档的隐含主题,而这些主题则最终呈现为一个包含同类词集的词汇表。通过这样一种机器语义分析的方式,在有效降低人工编码的随机性和复杂性的基础上,可以最大限度地挖掘文档与文档之间真实而隐含的主题关联<sup>[1]</sup>。

将主题模型或主题挖掘设为核心词,分别以篇名、关键词、摘要和主题为范围在中国知网进行新闻传播学科数据检索,可检出论文 56 篇,最早起于 2012 年的 2 篇,皆应用于微博文本的主题挖掘<sup>[2][3]</sup>,此后逐年渐热,2018 年达到了 15 篇<sup>[4]</sup>。经过几年的发展,主题模型的媒介分析样本也更加多元和具象,一方面微博舆情分析持续占据主体地位,并在微博群体用户画像、意见领袖挖掘和用户转发行为等维度得到了更精细的运用;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国家品牌形象、中美网络安全立法、公共政策网络传播、人民网雾霾报道等非社交媒体文本的研究也开始尝试主题模型分析方法。然而,根据知网分析数据报告,一个突出的现象值得关注,56 篇涉新闻传播的成果其第一学科属性皆被归为“信息科技类”,除去 25 篇博硕士论文,三分之一的文献来源为《图书情报工作》《情报科学》和《情报理论与实践》,新闻传播学专业期刊论文仅有 2 篇,分别来自《当代传播》和《现代传播》。

其实,这是人文社科运用计算机主题模型分析时存在的一个共同瓶颈,即受困于方法之囿,缺乏专业理论阐释。也就是说,以主题模型分析提取出的文本隐含主题及文本关联,不能只停留于样本规模和文档数据的独特性和新鲜性上,只有结合专业方向探寻互洽的解释性理论加以深入分析,才能最大效度地实现其学术和应用价值。这里以国际新闻报道主题挖掘及文本聚类的互洽理论为例,抛砖引玉,期待引起人文社科界,包括新闻传播学领域对主题模型分析运用趋势及其存在问题的关注和讨论。

## 一、主题模型分析与国际传播解释性理论的互洽点

传统的国际新闻报道主题分析与通过计算机自然语言处理获得的隐含主题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只是主题、标题、版面位置、报道倾向等实证研究的诸多量化对象之一,而且新闻文本的主题编码一直都存在效度和信度不足的问题:一是主题单位的设定标准取决于研究者对该主题的认知程度,且难以挖掘出隐形的内在线索;二是具体文本的主题归类标准取决于编码者对该文本的理解程度,纵然两位或多位编码者彼此印证调整,但在涉及价值、态度和信仰的条目上依旧存在较大主观性。隐含主题挖掘则基于国际新闻报道文本库,在计算机深度学习中实现海量文本的聚类 and 分类,可以较好地解决上述两个问题。只是,仅凭借计算机自然语言处理提取的主题词汇、主题链条和主题分布,并不足以解读和预测国际传播的现实问题,需要结合特殊的国际传播文本生产机制和特定的隐含主题文本关联特征,找准与主题挖掘能够互洽的国际传播解释性理论,才能进一步挖掘隐含主题的价值。

意义和意图共生共存于文本之间,意义依赖于又不完全依附于意图,意图隐含于又不只是勾联于意义,解读意义和阐释意图一直是国际新闻报道研究的重要维度。可以说,意义解读与意图透视,正是国际新闻主题模型分析和国际传播解释性理论的互洽点,是实现计算方法与专业理论融合运用的关联点。

### (一)意义解读层面的解释性理论

文本意义是不定的,特定的框架和语境会生成不同的意义,意义的生成过程需要借助框架和语境

[1]D. M. Blei, A. Y. Ng, M. I. Jordan, "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 *Journal of machine Learning research*, volume 3, issue 1, 2003, pp.993-1022.

[2]唐晓波、王洪艳:《基于潜在语义分析的微博主题挖掘模型研究》,〔北京〕《图书情报工作》2012年第24期。

[3]张培晶、宋蕾:《基于LDA的微博文本主题建模方法研究述评》,〔北京〕《图书情报工作》2012年第24期。

[4]中国知网检索时间为2019年1月1日。

理论分析来获得,这已是国际新闻报道文本分析的共识。框架理论(Framing Theory)揭示的是一种结构向度的意义生成原理,语境理论(Context Theory)则侧重于从内容向度分析意义的生产,两者相结合,可以立体地解读国际新闻报道中他国特定事件和事项意义生产的动态过程。

当前国际新闻报道研究在框架理论和语境理论的运用上本身就存在一定的问题,如研究目的先入为主,分析视角过度神化,样本选取方便为先,理论分析流于表象等。在意义解读层面,将框架理论和语境理论与主题模型分析方法相融合,会是一个极佳的纠偏契机。以“框架理论”为例,在中国知网以“框架”为主题的检索结果高达3703篇<sup>[1]</sup>,国际新闻报道研究占351篇,其中40%为硕士论文(141篇)。可见,“框架理论(Framing Theory)”是国际新闻报道内容研究中当之无愧的入门级高频理论,并且较多地被作为一种量化研究方法和比较研究工具为国内学者,特别是新闻传播研究初学者优先选用。其间有几个数据值得反思,一是框架理论和方法的运用自2003年的2篇发展至2017年的53篇,逐年快速升温,尚未有转冷迹象;二是以国际涉华新闻报道框架研究为主力,逾半成以“中国”“涉华”为篇名(179篇),且不包括“涉藏”“北京”“上海”等涉中国地域的报道研究,以及“一带一路”“7·5事件”“针灸”等特定事件或事项的报道研究;三是“框架”的研究功能大多仅为视角而非理论,采取了以既有目的牵引研究过程的思路,比如有71篇以“国家形象”为研究旨归的成果采用了框架理论;四是研究集中于个别几家报纸媒体,单《纽约时报》就以71篇遥遥领先于各媒体样本的榜首,而44篇国际新闻报道框架比较研究中,《人民日报》以30篇的份额成为“标配”的媒体比较中国选项。

## (二)意图透视层面的解释性理论

主体意图或许“先在于”却非“显在于”文本之中,基于隐含主题及其文本关联来分析意图,同样需要理论依据。而在国际新闻报道研究中,国际传播的属性决定了“一国”与“他国”对立关系的自然存在,国家利益是其间最根本的,也是最显而易见的纽带联接或冲突来源。“国家利益理论(National Interests Theory)”和“镜像理论(Mirror Theory)”,共同为国际新闻报道隐含主题及其文本聚类的意图分析提供理论解释。

事实上,国际新闻报道一向被认为与国家利益和他者镜像相关联,各国在彼此之间的媒体信息传播互动中打造自我身份,塑造他国形象,确定集体认同,判断国际关系,学界更是热衷于用“国家利益”和“媒介镜像”等概念来开展研究。以国家利益理论为例。中国知网检索结果显示,以国家利益作为主题的国际新闻报道研究目前已达206篇,加之分布于其他学科的相关研究,总量相当可观。然而究其问题,却依然如近十年前严怡宁在《国家利益与国际舆论》一书中所做出的论断:“涉华报道研究领域的‘国际利益’概念运用具有简单化的倾向,国家利益往往只是一个笼统的、静止的、铁板一块的‘符号’,是一种想当然的解释工具。”<sup>[2]</sup>这与层级丰富、排序复杂、差异显著、认知多元的“国家利益”现实并不相符。

## 二、意义解读层面的互洽:框架理论与语境理论

“框架”源自约定俗成,能以结构方式揭示新闻报道“在说什么”;“语境”通常独具匠意,可以内容方式透露出某篇新闻报道“在如何说”。经框架理论或语境理论分析的新闻报道,其意义解读不同于日常阅读的意义领会,也因此在国际新闻报道研究中颇受青睐。然而,新闻文本意义的生成是“框架”和“语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即将已然存在的框架模式和策略性给定的语境范畴用特定的方式联系起

[1]中国知网检索时间为2018年8月20日。

[2]严怡宁:《国家利益与国际舆论》,〔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6页。

来,在“框架”中使某一具体事件语境化,从而赋予该事件以特定意义。这就意味着,框架理论和语境理论结合运用才能更深刻地揭示国际新闻报道的意义生成。

在计算传播学主题模型分析方法引入之前,国际新闻报道内容分析受技术限制,要么采用框架理论分析大量文本,要么基于语境理论分析单篇或数篇文本,将两种理论结合来分析新闻文本存在实际困难。如果对框架理论和语境理论的意义生成逻辑和关系进行复盘式分析,就会发现计算机主题模型分析法可以突破这一困难,通过建立“在如何说”和“在说什么”分析过程的匹配关系,为结合使用框架理论和语境理论创造了可行性。

### (一)框架理论的意义解读逻辑及其对隐含主题的解释性

社会学家戈夫曼(Erving Goffman)认为“框架”“诠释事物的首要、本源的视角或解释图式……使原本无意义之物变得有意义”<sup>[1]</sup>。国际新闻报道主题模型分析不仅要思考媒体框架理论,还要顾及语义框架理论。传播学的媒体框架理论受益于人类学,语言学的语义框架理论则借鉴自早期人工智能领域,与主题模型分析同源。

1. 媒体框架理论。媒体框架理论对“框架”内意义的生产情有独钟。在人类学家贝特森(Gregory Bateson)《关于戏剧与幻想的理论》一文中,“框架”就是一套构建信息间彼此关系的一种阐释性限定,是传播者提供给受传者的应当如何理解“框架”内信息特定组合的阐释规则,为受传者分辨信息顺序提供了解释性的指导原则<sup>[2]</sup>。戈夫曼受此启发,进一步推导出“框架”的来源,即一方面为个体对于过去经历或认知的经验,另一方面是社会文化意识的作用<sup>[3]</sup>。媒体框架理论最重要的研究者加姆桑(Gamson)则明晰地揭示了媒体框架内的意义生成机制。他认为“框架”的定义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指“界限”(boundary,如摄像机的镜头)之意,凡纳入“框架”的实景,都成为人们认知世界中的一部分;另一类则指人们用以诠释社会现象的“架构”(building frame),以此来解释、转述或评议外在世界的活动<sup>[4]</sup>。“框架”是一种意义建构,而媒介框架是媒体基于现实的意义建构活动,以常人不易察觉的状态存在于新闻传播的各个环节。

2. 语义框架理论。1974年,麻省理工人工智能实验室创建者明斯基(Marvin Minsky)提出框架理论是一种呈现知识的模式,指出人类的知识以数据结构的形式贮存在记忆中。这个由固定的概念、对象或事件构成的数据结构被称为“框架”,而“框架”可以包含各种各样的事例和数据信息,利用多个有一定关联的“框架”组成框架系统,就可以完整而确切地把知识呈现出来<sup>[5]</sup>。这体现了一种透过“框架”内和“框架”间的桥联来呈现知识和意义的研究路径。“框架”语义学泰斗菲尔墨(Charles J. Fillmore)解答意义建构的灵感便来自于此。他提出将“框架”视为一个语义描述概念和一种意义结构化范畴<sup>[6]</sup>。语义框架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存在两个核心概念:一是菲尔墨提出的“原型(prototype)”,即通常定义和理解词语的意义所依靠的“框架”或背景,它们并非是世界的真正实体,代表着人们所

[1][3]E. Goffman,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86, p.21, p.21.

[2]Gregory Bateson, “A Theory of Play and Fantasy: A Report on Theoretical Aspects of the Project of Study of the Role of the Paradoxes of Abstraction in Communication”, *Psychiatry Res Rep Am Psychiatry Assoc*, issue2, December 1955, pp.39-51.

[4]W. A. Gamson, D. Croteau & W. Hoynes, et al, “Media Images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18, 1992, pp.373-393.

[5]Marvin Minsky, “A Framework for Representing Knowledge”, 1974, <http://web.media.mit.edu/~minsky/papers/Frames/frames.html>, 2018年6月20日。

[6]Charles J. Fillmore, “Scenes-and-frames semantics”, In A. Zampolli(ed.), *Linguistic Structures Processing*, Amsterdam: North-Holland, 1977, pp.55-81.

处的文化<sup>[1]</sup>；二是兰盖克(R. Langacker)提出的“凸显(profiling)”，揭示的是框架理论得以建构的基本观点，即语义框架是相关概念的连贯结构，如果对这一连贯结构的整体知识不了解，人们就无法完全理解其中任何概念<sup>[2]</sup>。

媒体框架理论和语义框架理论的共同点在于“框架”式思考，即不满足于字面意义，均包含有一种宏观思维、建构智识和网络视域。有所不同的是，前者更多地关注“框架”内意义的生成，后者从一开始就具有从“框架”内和“框架”间进行意义诠释的兼顾意识。“框架”内外，媒介文本意义的生成有赖于某种结构、关联、规则在各种多元而复杂的要件、节点、过程和现象之间去建立桥梁和联接。框架理论进行意义解读的“桥联范式(bridging model)”，与国际新闻报道主题模型分析具有路径互洽性。基于特定事件或事项的国际新闻报道文本库进行主题模型分析，最终会挖掘出事先预设数额的隐含主题。由于每个主题拥有不同的权重系数，主题间形成客观的自然排序，排序越靠前越重要；单个主题由特定数量的关键词构成，相当于所在“框架”的语义标签，因权重系数的不同和关联程度的不同，关键词之间也存在排序。以框架理论来解释，经机器深度学习提取的这若干个隐含主题，实际是从海量国际新闻报道信息中辨识出重复频率较高，较具强度的不同主题框架，而且能够依据时期变迁和国别差异来进行灵活的研究设计，在此基础上从单个主题框架内或多个主题框架间来解读媒体通过“框限”和“架构”现实所生成的意义。这使得通过主题框架内和框架间的桥联分析，来探知国际新闻报道针对特定事件或事项“在说什么”成为可能。

## (二)语境理论的意义解读逻辑及其对隐含主题的解释性

意义依赖于语境，西方语境理论的研究就缘起于对意义的探索。语言学家梵·迪克(Van Dijk, 2008)认为“语境不是一些客观的社会情境，而是基于参与者社会经验主观建构起来的关于这些情境中与他们相关的一些属性，也即心智模式(mental model)”<sup>[3]</sup>。“心智模式”表明了语境研究的认知视角。具体到新闻文本，传受双方作为对话参与者，通过对大量普遍的社会知识进行有意识地调控来对话语的策略性结构加以组织，建立话语与语境的关联，从而生产和理解话语的意义。

主题、语境与特定事件内容之间的认知关系即“心智模式”及其对意义建构和诠释的作用，实际上是语境理论长期关注的话题。每一个隐含主题的意义都是在若干个语篇语境中实现的，若要探知其间的策略，必须回归与该主题框架最为吻合的新闻文本。难能可贵的是，主题模型在挖掘隐含主题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副产品——文本聚类，同类的文本相似度较大，否则较小。文本库中每一篇新闻报道与各隐含主题之间都存在不同的关联系数，代表着不同的相似度，可以依据隐含主题的相似度实现文本权重排序。这就为语篇语境研究提示了一条路径，即在各隐含主题中选取权重最高的新闻报道作为样本，运用基于“心智模式”的语境理论对语篇中的特定事件或事项的语境参数、语境组合和相关语境因素加以分析。

1. “宏观结构”理论：隐含主题为内容认知限定语境参数。梵·迪克的宏观结构理论(Macro-structure Theory)就源自于“主题”概念的探究，是语境研究和话语分析领域最重要的理论贡献。这一理论认为，相对微观结构，连贯的语篇中诸多的话语序列都应有一个主题，语篇的连贯性取决其间句子与主题是否符合，只有全部符合时，才可能据此生成稳定的意义、诠释连贯的语篇。一个整体语篇中往

[1]Charles J. Fillmore, “Frame semantics”, in The Linguistic Society of Korea(ed.), *Linguistics in the Morning Calm*, Seoul: Hanshin Publishing Company, 1982, p.118.

[2]R. Langacker,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Stanford, vol.1, Palo Alt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3]T.A.Van Dijk, *Discourse and Context: A Sociocognitive Approa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56.

往存在多个主题的多次改变,尽管如此,它们从属于一个更大的整体结构,即宏观结构<sup>[1]</sup>。宏观结构所反映的是语篇话语的宏观意义,这个宏观结构的存为整体语篇提供了核心隐含主题。具体到媒体语篇,梵·迪克发现新闻话语具有不连贯地实现这一整体范畴的生产策略,图式规则或策略决定着各范畴的线性和等级顺序<sup>[2]</sup>。在标题、导语、主要事件、次要事件、后果、语境、历史、口头反应和预测等一系列主要的新闻图式范畴中,受媒体记者、编辑等说者所持有的新闻价值、事件认知和信息理解的影响,一些语义上并不重要的细节信息会通过放置在突出的新闻图式范畴中,从而有效地表达出主动信息。如此一来,宏观结构即隐含主题同时也为嵌入语篇的特定事件内容的意义诠释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语境参数。

2. “语境组合”理论:隐含主题为内容认知选择语境组合。美国哲学家斯塔纳克(Robert C. Stalnaker)的“语用预设(presuppositions)”理论立足于研究话语与其动态“语境组合(context set)”之间相互制约与相互凭借的关系,从“人对语句或主题的使用”这一角度来研究预设,并主张在语境中以说者和听者的假定和相信来定义和解释预设<sup>[3]</sup>。一方面话语作为命题规定了与它相关的语境组合,为听者圈定一个选择真值的范围;另一方面,语境组合又限定了话语真值的选择,即限定了对话语意义进行诠释的可能和范围。也就是说,决定话语意义的不一定是话语本身,而是这些语境组合<sup>[4]</sup>。这与梵·迪克基于社会普遍知识的意义生成“心智模式”不谋而合。

预设是被说者当作或认为与听者共有的知识,被预设的是隐含主题,隐含主题具有从“语境组合”中获得真值的可能。但表达说者的预设更为基本的方法是与预设相一致的语境组合。也正因如此,预设限制了可供选择的语境组合。主题作为一种预设,可以起到为内容认知选择语境组合的功用,语境组合继而对话语作为命题的表述和意义的诠释去加以限制,特定事件内容的意义便在这种相互制约和作用的过程中得以实现。

3. “整体语境”理论:隐含主题为事件框设语境因素。整体语境主义学者哈瑞斯(Roy Harris)的多元化体系作为语境分析的方法被广为接受。他根据构成语境的知识 and 意识的相互作用确认了七个语境类型:世界知识、语言知识、作者、体裁、集体知识、特定知识和语篇因素<sup>[5]</sup>。这一细分化的多元语境因素列举具有整体语境特征。哈瑞斯在《符号、语言和传播》(Signs,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sup>[6]</sup>这本试图挑战西方学者传播学研究传统智慧的著作中,将美术、音乐、雕塑同语言合而论之,认为只有整体主义路径(integrationist approaches)才有可能公正地呈现日常事实。这一论断的基本前提是,人类个体的心智生活是一种将过去、现在与未来合为一体、体力与心智融为一体的持续性尝试。意义恰恰生成于、来源于这一整合过程,是一种持续不断的意义制造和再制造。不仅如此,他认为对整体主义者来说,符号知识和世界知识都是语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此一来,嵌入不同的隐含主题同一事件,其语境因素源自于不同隐含主题的框设,语境因素的分析因此需要多元学科背景的支撑。

综上,国际新闻报道主题模型分析当归于宏观的语篇语境研究,着眼于语篇的总体框架或组织原则。每一个隐含主题都在语境中实现意义,特定事件的意义取决于环绕左右的具体语篇语境,而不同

[1]T.A.Van Dijk, *Text and Context: Explorations in the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of Discourse*, London: Longman, 1977, pp.130-142.

[2][荷]托伊恩·A.梵·迪克:《作为话语的新闻》,曾庆香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57页。

[3]Robert C Stalnaker, “Presuppositions”,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Logic*, vol.2, 1973, pp.447-457.

[4]Robert C Stalnaker, “Assertion”, *Syntax and Semantic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8, pp.315-332.

[5]Roy Harris, *Language, Saussure and Wittgenstein*, London: Routledge, 1988.

[6]Roy Harris, *Signs,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6, p.x.

的语篇核心隐含主题具有为这一特定事件内容在宏观结构上限定语境参数,在语用预设层面选择语境组合,以整体主义理念框设语境因素的功用,从而体现出特征不同的心智模式和话语策略,帮助解释国际新闻报道“在如何说”这一问题。

### 三、意图透视层面的互洽:国家利益理论与镜像理论

“理解意图是人类认知的关键性发展……意图使意义明确。”<sup>[1]</sup>说者若没有主体意图,其话语的意义也就无以存在;说者传播特定事件内容的主体意图往往以隐含的方式存在于话语的框架和语境及其相互关系之间,需要更加深层次的意图透视。如果说,“国家利益”理论可以透视出国际新闻报道的显性意图,“镜像”理论作为一种自我认同,则可用以揭示隐含于框架和语境之下的主体意图。

#### (一)国家利益理论的意图透视逻辑及其对隐含主题的解释性

由于媒体在“国家利益观”形成中历来有着特殊的作用,国家利益理论也是国际新闻报道主题模型分析中必然触及的解释性理论。每一篇国际新闻报道都或多或少地映射着媒体所属国的国家利益,从同一隐含主题框架在国家间的权重对比中,就不难感受到国别不同所带来的国家利益诉求侧重。具体而言,媒体通过支配和操纵来获得观念建构的权力,支撑着其在“国家利益观”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一是媒体舆论促成国家利益分层,形成丰富的国家利益外延;二是媒体舆论创造国家利益共识,牵动复杂的国家利益议程;三是媒体舆论呈现国家利益差异,在冲突与协调中达成国家利益的相对共识;最后,媒体舆论反映国家利益判断,在多元观念中透视国家利益的主观意识。因此,“国家利益”理论可用于揭示国际新闻报道隐含主题的显在意图,回答“想如何说”这个意图透视问题。

1. 隐含主题国家利益分析的双向度。玛莎·费丽莫(Martha Fennimore)从三个维度阐释“国家利益”概念:(1)国家利益是统治阶级确认的,能够给国家带来效用的事物的总和;(2)国家利益的确认过程是统治阶级内部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过程,国家利益体现为博弈的结果;(3)国家利益是国际社会的产物,具体国家确认国家利益的过程是与其他国家相互交流学习的过程<sup>[2]</sup>。这一概念阐释说明,在理论维度上,国家利益作为国内博弈过程和国际互动过程的产物,需要从国家内和国家间两个视角加以动态的历时和共时分析。特别是“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国家利益’具有不同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同一阶段的‘国家利益’同时具备外部和内部两个侧面,并相互发生影响”<sup>[3]</sup>,这时,国家间与国家内的双向度理论视角就显得尤其重要。

2. 隐含主题国家利益分析的辩证性。以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为代表的经典现实主义学派强调,“只要世界在政治上还是由国家所构成,那么国际政治中实际上最后语言就只能是国家利益。”<sup>[4]</sup>然而,即便是作为国家存续的基本条件,国家利益也并非形而上的语言,运动、发展、变化的辩证性解析始终是国家利益理论的重要思维。一是内涵与外延的辩证分析。认为国家利益是一个具有特定内涵(一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基本需求)和丰富外延(依据层次、程度、范围而有别的利益构成)的综合概念;二是恒定与变化的辩证分析。认同国家利益作为一国国际关系根本因素的稳定性,也关注因历史阶段、利益集团、阶层认知而带来的变动性;三是绝对与相对的辩证分析。尊重单一国家利益的绝对主张,也重视国际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的相对平衡;四是客观与主观的辩证分析。在以客观实在性为国家利益设定边界和框架的同时,又以主观意识性为国家利益观的探究提供视野和方向。

[1]T.A.Van Dijk, *Discourse and Context: A Sociocognitive Approa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88.

[2][美]玛莎·费丽莫:《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袁正清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3]王希:《美国历史上的“国家利益”问题》,〔北京〕《美国研究》2003年第2期。

[4]Hans J. Morgenthau, *Dilemmas of Politic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p.68.

3. 隐含主题国家利益分析的建构性。社会共有观念建构了国际体系的结构并使这种结构具有了动力<sup>[1]</sup>。将这一建构主义哲学具体到特定事件或事项的国际新闻报道隐含主题分析中,在国际政治关系层面,意味着虑及国家之间的国家利益差异和判断,因为正是基于差异的辨识观念最终形成关于判断的共有观念;在国家外交政策层面,则可以洞悉国家之内因阶层、集团、国家身份认同的观念差异所带来的国家利益分层,以及各种或一致、或协调、或冲突、或竞争的国家利益在达成共识的过程中所获得的复杂排序。国家利益的这种分层特性、共识特性、差异特性、判断特性实际源自于国家利益自身各种辩证关系的存在,更充分地证明了是观念造就了权力和利益,权力和利益通过社会共有观念才具备了实际意义。

## (二) 镜像理论的意图透视逻辑及其对隐含主题的解释性

“镜像”一词在国际传播研究中常被引用,在大多数情况下被浅显地阐释为作为“镜子”的媒体所反映的国家形象。实际上,镜像理论更深层的价值在于它暗含着自我与他者微妙关系的隐藏意图。不仅如此,只有认识到这是一个中西方哲学共存的概念,认识到中国哲学所参透的整体视角与西方哲学所揭示的比较视角之间的互补关系,才能让镜像理论的运用获得与国际新闻报道隐含主题相匹配的隐性意图透视力度。

1. 西方哲学的“镜像”比较观。受“自我反思”这一研究传统的影响,西方哲学中的镜像理论往往在自我与他者的比较关系中破题,最具代表性的即雅克·拉康和巴赫金各自的镜像理论。

拉康以镜为喻,以悲观的主体性视角探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认为镜像让人从最初就产生一种通过建构他者来获取自我认知的欲望和圈套<sup>[2]</sup>。他将人生分为两个镜像阶段:在未成年的镜像阶段里,自我的误认和他者的关注共同生成了想象域中的“伪自我”;而在成年的后镜像阶段里,自我的投射与他者的言说塑造了象征域里的“社会之我”。由此推及,以本国报道他国新闻报道反视自己,一个不容忽视的作用是在通过这一参照物实现自我认同,这种主体性视角之虚无,难免产生虚无对自我的左右。

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同样是巴赫金镜像理论的基本出发点,不同的是他采取了积极的外位性视角:“我要认识完整的自我,除了自我内省外,还需要借助他人的外位,从他人对我的感受中感受到自我在人群中的存在状态。我与他人之间彼此印证彼此的存在,彼此是进行平等对话的关系。”<sup>[3]</sup>可见,巴赫金主张跳出镜像这个圈套,为依靠他人来实现自我认识提供了一种积极的实践办法。反观国际传播,被报道国确实需要主动以国际新闻报道作为他者映证来获取完整的自我,同时也应认识到他国媒体报道作为他者评价原则上无法实现真实反射自我,当避免媒介幻象对自我的奴役。

总之,镜像既为他者映射,亦为自我投射,是自我的认知途径和主体的形成过程。国际新闻报道呈现出的媒介镜像,便是这样一种以自我中心的主体认知关联物,包含“建构他者→定位自我”和“他者映证→认同自我”的双向过程:一方面借助国际新闻报道建构他国,以他国为参照来实现自我认同;另一方面借助他国的国际新闻报道映证本国,倚借于他国之描绘来认知自我。因此,西方哲学的“镜像”比较观对国际新闻报道主题模型分析的价值在于透视的是更深层次的媒体报道主体性意图。

2. 中国哲学的“镜喻”整体观。“镜喻”在中国儒、道、释教中皆有所述,文、诗、画论里亦常有此说。无论是以镜为鉴的政论,还是以镜喻心的禅意,除与西方哲学一致包含有照人(主体性)和照物(外位性)的视角之外,最引人之处在于其加入了时间、空间和质量维度的整体视角。由于世间万物的演化秩序确立于时、空、质之间的依存关系,镜与像之间“静与变”“一与众”“虚与实”的辩证关系便在这一

[1][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2]吴琼:《雅克·拉康——阅读你的症状(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1-138页。

[3][苏]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1卷)》,晓河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8页。



哲学关照下脱颖而出。

《五灯会元》之《黄龙祖心禅师》里说：“镜像可谓有，揽之不盈手。镜像或谓无，分明如俨图。”<sup>[1]</sup>镜像为虚，事境为实，媒体的语符之镜本为虚空方可映出事件之实像，框架与语境决定了媒体难以为明镜，而是昏镜和碎镜居多，心随境转方合常情常理，对于媒体镜像的虚与实在质量维度上加以明鉴才合情合理。国际新闻报道主题模型分析样本和数据具有与中国“镜像”哲学相结合的特性。主题模型分析首先需要建立关于特定事件或事项的海量新闻文本库，为实现这一点，通常样本截取时间跨度长达几年或数十年，样本来源空间分布涉及多个或数十个国家，样本内容不单纯报道特定事件或事项，而可能涵盖政治、经济、社会、地缘等多个或数十个领域。国际新闻报道所呈现的媒介镜像因时间、空间、质量的变迁而变化，因视角的改变而变化，背后牵涉的是国家自我认同这一隐性意图因时、因境、因人的变动。将中国哲学的“镜喻”整体观作为解释性理论，通过对媒介镜像变迁、媒介镜像分布和媒介镜像内涵的分析，来解释源于自我认知和主体形成的深层次意图的变化，可以显著提升主题模型对于国际传播策略验证和趋势预测的价值。

## 结 语

在全球网络传播时代，特定事件或事项的国际传播要拥有空前的力度和规模并非难事，但是，在海量的信息中，它们也不过是一个极小的主题，被置身于庞杂的意义生成环境之中，建立在受复杂因素影响的他国媒体意图基础之上。不仅如此，国际新闻报道对事件或事项的表述即使与该国官方完全一致，即便对事件或事项的话语援引全部依赖本国信源，由于不同认知框架和语篇语境的新闻意义的塑造，由于不同国家利益和他者镜像对报道意图的影响，事件或事项的传播总会呈现千差万别，甚至出乎意料的认知和解读。

框架理论倚借约定俗成的“桥联模式”，通过揭示框架间、框架内结构的方式，表明国际新闻报道“在说什么”；语境理论运用独具匠意的“心智模式”，以特征不同的语境策略透露出国际新闻报道“在如何说”。意图隐含于意义之中，国际新闻报道“想说什么”和“想如何说”涉及到更加深层次的意图透视。国际新闻报道的意图从根本上源于“国家利益”这一主体需求，并最终诉诸于“镜像”这一寻求自我认同的隐性内核。意图作为土壤滋养着意义，意义解读与意图透视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不仅如此，言之有意，言为心声，意义生于心而成于言，意图动于心而形于言，“言”为媒体文本，“心”为主体自我。国际新闻报道的意义和意图从根本上说均基于主体自我的观念。对意义解读层面和意图透视层面的两对理论加以研究后不难发现，主体认知是框架理论强调的关键理念，自我中心也是语境理论的核心概念，国家利益理论从根本上源于主体需求，镜像理论的最终所释惑的也是自我认同问题。归根结底，“以我为主”和“观念”是各国国际新闻报道的本质，在特定事件和事项上尤其如此。

由此，意义解读和意图透视既是国际新闻报道研究的重要维度，也是国际传播学的现实难点。主题模型分析这一计算研究方法在意义显现和意图洞见方面所拥有的特殊优势和价值，加上其与国际传播学理论的契合点和互洽性，有助于意义解读和意图透视这一国际传播学重要维度的创新和现实难点的突破，可为主题模型研究方法与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进一步结合提供一种新视野。

[责任编辑：平 啸]

[1][宋]普济：《五灯会元》，[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卷17。